换个视角看问题

□ 徐祥运　林　琳

在职业生涯中，如何安排自身角色序列进行角色选择对于科学家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以大学校长为例，目前，中国科学家在保留科研职务的同时担任高校校长的“双肩挑”现象普遍存在。最显著的现象就是我国“985高校”的校长大多数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并且这些院士科学家同时也是各高校的学科建设学术带头人，既掌握着行政权力，又控制学术资源。在许多发达国家，诸多著名高等学府也倾向于在学术成绩斐然的科学名家中选拔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担任校长。但这些著名高校相关规章条例对校长的角色职权范围作了明确规定，避免校长滥用行政权力破坏科研资源的公平竞争原则，一个科学家如果有意成为大学校长，他将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原有的科研职位，不再直接参与科学项目研究和科学成果评审。这种通过制度明确划分科技体制中研究角色与管理角色的职权界限的做法很值得借鉴。

建立专业的科教管理队伍

将科研教学管理职责从教育家的一系列职责中单独剥离出来，成立一支专门化的科研教学管理队伍，以提高科研效率和科技管理水平，是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顺应时代走向的必然要求。首先，要明确界定科研教学管理人员的职责，科研教学管理职位应当由具有科研背景的人士出任，但在选择从事管理职位之后，必须放弃原有的科研职位。其次，要建立规范、完整的科教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制度，对科教管理人员进行系统专业的选聘、管理知识培训、考核。挑选一批教育学者，训练他们，使他们具有组织管理、公共关系、掌握财务等方面的艺术，以适应大科学的需要。最后，应科学设定科研机构中专门科教管理人员的职位和人员数量，避免机构臃肿、人员冗余，使科教管理队伍流于官僚化。

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是社会组织提高生产效率的必然要求，科学体系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也不例外。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科学发展实践证明，使管理转化为一项专门职业对提高科研效率具有关键的促进作用。教学研究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应各司其职，对于双方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都将是一个巨大进步。这不但使具有杰出天赋与才能的教学专家免于分散时间精力，得以专心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创造重大科学成果；同时也使科研组织得到更专业有效的管理决策，避免行政权力对科研资源及奖励的公平分配产生干扰。

完善教育家职业规范

在现今科学与社会各领域相互渗透，教育家的角色内容也逐渐多样化，科学不再是单纯依靠科研热情而支撑的社会活动，而是变为一项能带来很多现实利益的专门职业。教育家的价值规范要求其为教育事业无私贡献，不谋私利，但当教育职业成为一项可用于谋生的职业时，功利因素就成教研学者在定位自身角色时必须考虑的条件。因而在“义”与“利”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常常陷入困境。

在中国的科研体制环境中，优秀的教育人士选择担任行政职务的人数众多。掌握了行政权力，就掌握了支配科研资源和科研环节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在申报项目、获取经费、成果署名、评奖、晋升职称、出国考察、收入分配等方面具有一系列隐形的优先权，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简单地把领导职位作为吸引人才的砝码，把教育家担任行政职务作为重视、关心人才发展的重要措施。

出于现实的利益因素选择行政任职对于教育专家个人而言，是一种“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但是从国家教育发展大局来看，这无疑是巨大的人才资源损失。在现今中国科学建制化不够完善，教育家职业化不够成熟的现实环境中，仅仅依靠教育家的道德自律和个人觉悟来选择角色定位和遵循科学价值规范是行不通的。教育家职业规范守则对于教育家职业角色转变的保障作用体现在，教育家进行职业角色选择与转换时应该有据可依，有据必依，从客观的、制度的层面上促使杰出教育家在选择行政任职时更趋理性。

破除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在我国，国家公务人员具有较好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是可以直接运用社会公共权力和资源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个群体，这项职业具有稳定、福利好等优势。所以，教育家在面临职业和官职选择时，这种职业所带来的福利和权力预期的诱惑就比较大，不失为职业选择的“上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转型的特殊艰难背景，个人的发展面临着更大压力和更多不确定性，杰出教育家在职业选择和社会角色转变时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行政任职提供的美好愿景正好契合人们的保守求稳心理。

避免“官本位”思想对于教育界专家学者职业选择和价值选择的消极影响，并非简单地归结为反对和禁止杰出教育家从政，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就必然滋生不良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宏观科研体制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杰出教育家担任行政任职能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在于本人的意志和制度的导向。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从政，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更需要一批优秀人才去从政。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避免“官本位”思想影响科学家非理性选择行政任职，所以在科学精神昌明的今天，科学理念深入人心，破除“官本位”思想对人们就业观念的禁锢，是革新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政策的思想支持，也为科技人才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另外，我国的科技人才政策存在用当官奖励科研成就的倾向，忽略挖掘科研人才的创新潜力，使许多有才华的科研人员在创新能力最旺盛的年龄，从事与科研活动无关的行政工作而不能专心投入科学研究，这是一种人才浪费。

完善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

科学社会学的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一个公正、合理、行之有效的国家认可机制，会很好实现对科学家的精神激励，促使科学家在满足了自身依据科研贡献理应获得的名利需求后具有更大的动力去创造新的科学成果，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和传播。

但在我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作为我国科学认可机制的重要载体——院士制度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都没有实现规范化运行，这导致许多科学家在做出独创性贡献后，不能及时获得相应的科学奖励与荣誉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行政任职而获得行政权力及附加于其上的各类利益来作为自身科研贡献的替代性回报，以及维持自身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地位等级的替代性资本就成为了必然，这是造成我国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人数众多这一状况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杰出科学家国家认可机制的完善和革新是杰出科学家职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我国，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也是杰出科学家国家学术认可机制不严密的例证，只有国家和科学界依据科学家取得科学成就和科学贡献的大小来公平、公正、合理地授予科学家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科学家选择各种非科研任职来补偿和满足自身利益需求。

规范和完善国家科学奖励和认可机制，是改进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问题、完善我国科技管理机制的重要外部条件，对充分发挥杰出科学家群体的科研领军作用及科研创新职能，推动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影响深远。

教育视野

关于成长最好的方式

□ 李文文

“如果讲呼吸代表着生命，请问谁在关照呼吸？如果讲心跳代表着生命，请问谁是心跳的听众”？奥修如是说。在纷杂的世事中，在紧张忙碌的工作生活中，在纵横交错的种种关系与织结中，有种关系甚为微妙，就是人和自己的关系。了解他人可以称得上是智慧，而了解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明通达，战胜别人算得上是有力量，可是真正的强者是指能够不断超越自我的人。人需要反观，对自己有个观照。孔子文化讲求“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讲求“修己安人”，先做好自己；讲求“自知自省”，在对自己的反观中认知、省察、超越。自己是原点，亦将成为终点。自我的观照，是关于成长最好的方式。

对自己有个观照，从哪些方面入手。曾子的话给我们启发：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第一，做事情有没有尽到自己的忠心？关于“忠”，朱熹云“尽己之谓忠”。真正的忠心，要尽到自己的全力，竭尽所能。非出工不出力，更非推诿扯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第二，与朋友的交往有没有尽到“信”？这也是“忠”的表现，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对自己的承诺全力以赴，尽到忠心，产生信任，这是长久交往的根基。

第三，关于传道授业。传在老师，习在自己。只有传习才有传承，才有生生不息。

“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代表了天地人，代表了你我他。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不是指三个人行走，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而是人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师，都有优点值得学习。此处的“三省”，亦不是每天反省三次，而是每天都多次反省自己，自我反省的重点就是：竭尽全力的做事之道；真心诚意的待人之道；恭敬认真的传习之道。依此便知每天的重点，有工作计划，还有学习计划，亦勿忘记人情往来。

对于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觉知，如同蒋功勋先生在《汉字书法之美》一书中对于汉字的表述，“笔画多，不觉得大，不觉得繁杂；笔画少，简单，也不觉空疏，都占一个方格，都有一种存在的自信……不可抖的慎重，不可歪的端正，自己作为自己不可取代的自信”。人如其字，理应从头慎重，端正到底。

经典今读

纪念汤公何须牵及莎翁

今年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世界范围纪念活动很多。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有什么共性？为此，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 刘　火

400年前的4月，莎士比亚走进天国；400年前的7月，汤显祖成为仙人。400年间，潮起潮落，人来人往，中西走势各不相同。莎剧自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后，风靡世界；汤戏在当时如日中天却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衰落。莎剧汤戏，原本地球各执一端，并无联系，只因莎剧成为全世界文化表征时，汤戏还仅限于国内的文化宝贝，于是，国人便以莎剧作为参照，来观看汤戏的意义与价值。据说最早进行这一观照的是左翼戏剧理论家赵景深于1946年的一篇题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还有人说是梅兰芳1935年赴欧洲等地演出时，曾以《游园惊梦》示戏剧理论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人（但在1961年梅先生在中国戏曲学院戏曲表演艺术研究班上的《我演〈游园惊梦〉》的长篇报告里并没有提及曾携《游园惊梦》三十年代赴欧演出一事），且布莱希特因观梅戏后，对自己的戏剧理论进行了重大变改。不管这一据说有没有根据，一个事实是，汤戏进入西方显然晚于莎剧进入东方（中国）。

莎剧成为世界意义和成为经典，并不是莎士比亚生活和莎剧首演的十六世纪末与十七世纪初，而是十九世纪。在这两百年间，英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革命带来的崭新天地，特别是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所形成的全球殖民，或者全球视野，让英语散布全球。于是，莎剧也跟着英国的（第一波）全球化遍布全球（据说当今说英语的国家多达100多个）。而汤戏产生后不久（1598—1644年），本已经有了足够经济文化繁华的明代成为历史。接下来，一方欣欣向荣突飞猛进，另一方却闭关锁国且文化日趋保守与钳制。莎剧，不管它是以强权的殖民方式，还是以温和的文化输出方式，从十九世纪大踏步、全方位地走向世界；而汤戏，则由于民族由于语言，其没落便成为必然。虽然，清初，汤公的戏依然魅力四射（《桃花扇》里的李香君一开始学戏，学的就是《牡丹亭》，学的就是《玉茗堂四梦》），但一是它仅限于南方，二是它没能进入文化中心。更不可能像莎剧那样随着英语的全球弥散，“走村串户”似地深入到世界各地。显然，在第一波全球化的进程中，汤戏仅限于明季之后的王朝，仅限于汉语文本自身，这并不是汤戏的不足，也不是汤戏可不可以与它戏擂台的事。汤戏与莎剧，完全不对等的时代背景、宗全不对等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对等的传播路径，非要把汤显祖说成是“东方的莎士比亚”，非要把《牡丹亭》与《罗蜜欧与朱丽叶》比较，这岂不是胶柱鼓瑟吗？

70年前，赵景深指出莎剧与汤戏大约有五点相似，其中重要的是莎翁与汤公相同卒年，两人都属不羁的天才，悲剧动人。1930年日本人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第一次指出，汤公与莎翁“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无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人青木正儿，还是四十年代的国人赵景深，对汤公的评价，或者说把汤公与莎翁并莲评价时，所给予了汤公很高的评价即把汤公与莎翁“平起平坐”。但是，一眼望去便知，这是东方曾作为近现代被殖民心态的一种不自信的自信。事实上也是如此，尤其是称汤公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虽说这一称谓给予了汤公极高的荣誉和高大上的肯定，但其隐形意识和这一隐形意识原生的隐形文化结构（甚至还可能涉及到隐形的社会结构），昭示的却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不自信。

十九世纪以降的200年间，莎剧在全世界所奠定的地位，包括它在中国戏剧史和当代戏剧所奠定的地位，已无法撼动。而汤戏特别是《牡丹亭》在它诞生时和诞生后的一段时间，其艺术的精湛、剧目的标高、声誉的隆盛，显然是其他剧不能比拟的。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上文已说原因，与莎剧并论，大约无法比较。美国著名文论家勒内·韦勒克指出，“比较文学”本身就是一模糊的术语与范畴，且运用的历史大约不过百来年的事情，而且经常地发生“危机”。因此，盲目地用所谓“比较文学”的观点和术语范畴来观照和约定莎剧与汤戏，无论对莎剧还是对汤戏，特别是对并没有完全走出国门的汤戏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汤戏里精彩桥段与源于唐诗宋词的唱词，莎剧是难与企及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像莎剧那样持之以恒地籍考、整理、翻新、推广方式来籍考、整理、翻新和推广汤戏。当下，在我们的古典戏曲面临电子媒体冲击所有层面的危机时，我们如何对待如“临川四梦”一样的古典戏曲。如果仅有一个白先勇先生改编后只有九出的“青春版牡丹亭”，或者还是老样地在那里演过多遍且没有翻新的《游园惊梦》，那么，我们的汤公，我们的汤戏，也许永远不及莎剧。哪怕你有“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那般婀娜曼妙的唱词，哪怕你有《牡丹亭》那样惊世骇俗又异常缠绵悱恻的人鬼相恋的“还魂记”。

在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年的时候，不必跟他人比（譬如五年一届且各国申办的“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到今年已是第十届了）。文化的自信，源于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知和普及，源于真正地做事。一点一点地做事，一点一点地普及，而且持之以恒，永不放弃。

文化透析

（上接1版）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创新，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使市场供求规律能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以便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同时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推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创新，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对国际资本的有效监控。

三是全力支持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积极培育多层次、多元化、良性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努力开创金融支持就业、扶贫、助学等民生工程的新局面；加大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和科技、文化产业、旅游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

四是全方位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稳步健康增长，深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全面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市场流动性。继续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根据经济景气变化、金融机构稳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对有关参数进行适度调整，引导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根据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综合货币收支和流动性供需关系，运用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逆回购、正回购等各种流动性管理工具，综合调节好银行体系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平稳浮动。

五是切实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巩固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评估体系，强化不同行业、不同市场和国际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防范部分地区、行业、企业等实体经济风险及非正规金融风险向金融体系的传导。建立风险预警和处置预案，促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内控和风险管理，继续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业的风险评估与监测管理。

增强金融治理能力，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

在世界金融格局调整变化的格局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治理的重心是金融治理能力的提高。因此，中国金融业要实现全球的战略定位必须厘清面对的主要困难与挑战。

金融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发展中大国，要想在全球金融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实现后危机时代金融的战略定位和跨越发展，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宏观金融环境必不可少，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应不断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努力克服以下三大障碍：

利率市场化障碍。利率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基本价格，是其他众多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定价的参照基准，因此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分别经历了放开国内外币存贷款利率，扩大银行贷款和存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在企业债、金融债、商业票据方面以及货币市场交易中全部实行市场定价，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等阶段，但这远未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金价格市场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继续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资本流动障碍。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经济空间的逐步拓展，资本市场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其重要性日益明显。目前，中国在国际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不高，从而阻碍了国际资本的流入。尽管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能够有效地防止资本快速流动引发的风险，但是也失去了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好处。未来中国要想在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间找到平衡点，扩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就要适当地解除资本的流动障碍，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竞争。

汇率障碍。根据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模型，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未来中国要想在实现资金全球配置的同时，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更为重要的是，汇率制度改革还能够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今后仍需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提高在资本开放过程的中的抗风险能力，为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的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金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目前，中国的金融结构系统仍然以银行为主，这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中占有绝对优势，资本市场的发展尽管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但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保险业、信托和金融租赁业发展缓慢，社会融资风险高度集中于前者。过多的货币性资产无疑会压缩社会融资的途径和空间，降低金融创新的能力和动力，使得企业的负债水平居高不下，不利于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其资源分配又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从而将大多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这在客观上催生了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市场，在加剧金融系统不稳定因素的同时，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中国金融城乡二元结构有待缩小。一方面，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产业化程度低，经济效益不明显，信息成本较高，又缺乏足够的抵押担保品和防范风险的可替代手段，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在上述地区开展业务，造成“市场失灵”；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补贴和非营利性组织捐助等形式注入的资金，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原因，在实践中使用效率较低，违约情况时有发生，影响了资金的循环使用，并降低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整体信用状况，造成“政府失灵”。上述两种“失灵”反过来又会产生明显的虹吸效应，引起资金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的逆向流动，进一步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合理、均衡的金融结构的形成。

因此，中国金融如果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实现战略崛起，必须首先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难题，不断优化金融业的内部结构，建立统一的全国金融市场，推动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

提高对金融治理重要性的认识。纵观世界各国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的挑战，其中，金融治理的重要性在此阶段起到决定性作用。中等收入陷阱源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经济不稳定，而经济不稳定则主要源于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所以频发金融危机，是因为其经济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一系列结构问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防范金融危机：政治上，要建立强有力的支撑改革和审慎监管的体制；政策上，要及时、审慎地推进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技术上，要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维持金融稳定，并建立有效应对危机和加速危机恢复的机制。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同样在于避免金融危机。而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主要在于防止不稳健的金融自由化和对企业债务问题的不当处理。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